



甘肃当代女性 写作史稿

中
刘洁 / 主编

GAN SH
DANG DAI NV XING
XIE ZUO SHI GAO

甘肃女作家群以近乎虔诚的态度坚守文学阵地，扎根西部，成为国内少有的女性文学劲旅。他们极富魅力的作品绘制出了陇原绚烂的民族文化版图。打开这幅文化版图，西北边陲地域特色和多民族的绚丽色彩扑面而来，显现了甘肃美丽的山水，以及各族人民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战胜贫穷，走向富裕；告别蒙昧，走向科学突破闭塞，走向开放；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一派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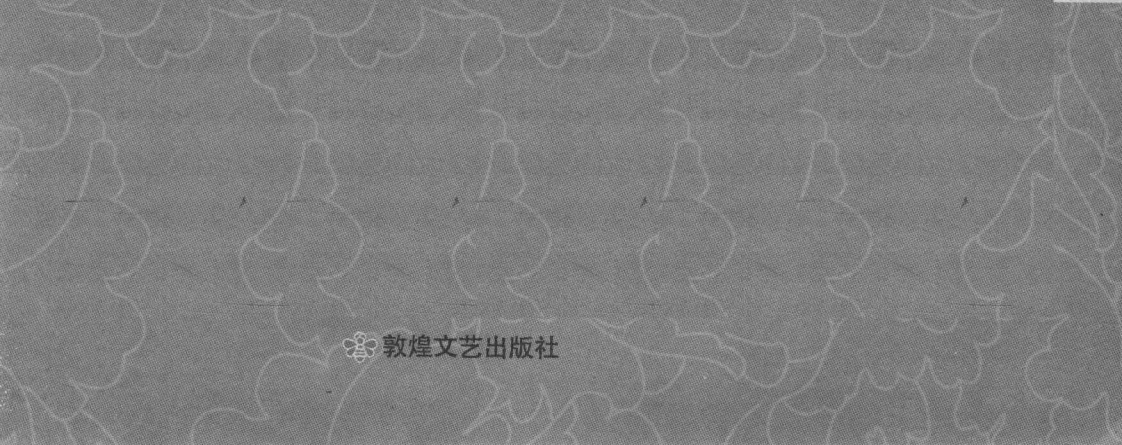
甘肃当代女性 写作史稿

● 刘洁 / 主编

GAN SH
DANG DAI NV XING
XIE ZUO SHI GAO

作家群以近乎虔诚的态度坚守文学阵地，扎根西部，成为国内少有的女性文学劲旅。他们的作品绘制出了陇原绚烂的民族文化版图。打开这幅文化版图，西北边陲地域特色和的绚丽色彩扑面而来，显现了甘肃美丽的山水，以及各族人民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战胜贫向富裕；告别蒙昧，走向科学突破闭塞，走向开放；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一派胜景。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第八章

塞外江南多才女

——风格多样的天水女作家群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天水文坛活跃着一支女作家队伍。这支队伍人数不菲，创作颇有特色。就总体看，女作家们立足本土，关注妇女命运，用女作家纤细的笔触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地区妇女生活的历史变迁，从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庞瑞琳、匡文立、牛正寰、周如镜、何道华等是天水最早步入文坛的当代女作家，有人称她们是天水早期文坛的“五朵金花”。她们的作品带着激进时代的热情，述说着、歌咏着人们对生活的思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庞瑞琳是天水女作家群的大姐大，本章在第一节评述她的创作；甘肃著名女作家匡文立在此起步，她是兰州来天水插队的知青，20世纪70年代，在她被抽调到招待所当服务员的时候，就开始了写作和思考。处女作《复课》发表之后，又连续写出系列作品，迅速奠定了她在甘肃文坛的重要位置；从少年时期就征战于乒坛的运动员牛正寰1980年也在此地写出了引发众人思考争论的短篇小说《风雪茫茫》，迅速实现了从运动员到作家的转换；来自北京的姑娘周如镜，在水表厂担任会计，同时也是一位勤奋写作的女作家。她的笔触细腻、清新，在省级文学期刊发表了散文《山啊，告诉我什么》《云梦三章》，微型小说《空



篮》，童话《彩色的歌》。可惜她英年早逝，留下诸多遗憾；何道华也是70年代的下乡知青，1988年曾现在《飞天》发表小说《旅途》等作品，后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和市妇联领导工作，因工作繁忙渐渐中断了文学创作。

二

90年代以来，天水文坛新一代女作家周小华（笔名杨景）、卿晓晴、胥海莲、刘淑静（笔名淑曼）、李桥、李蕴珠、杨玲玲、张向红、兰叶子等现身文坛，以新的审美观念、多姿多彩的创作风格为天水文坛注入了新的血液。

周小华（笔名杨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自1986年以来，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飞天》《西北军事文学》等杂志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600多篇（首），出版诗集《浴女的第三只眼睛》《浴女的蓝蝴蝶》，曾获得国家、省、市奖项十余次。现任天水市文联创研室二级创作员。她在创作中充满激情，力图寻觅诗意的美丽与深刻；卿晓晴是公安战士，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法制文学研究会会员，甘肃省作协会员。她的创作重心是讴歌公安系统的英模。自1989年以来，她已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侦探小说数十篇。报告文学《燃烧是你不灭的爱》《追赶太阳的女人》分别获公安部1992年征文三等奖和1995年征文一等奖。《金蝉》《风中有把杀人刀》等作品也在省市征文大赛中获奖。她努力塑造西部公安干警的英雄形象，探寻公安工作的深刻价值；白衣战士胥海莲供职于天水第一人民医院，自幼酷爱文学，自1989年开始，先后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发表各类作品十余万字，小说《丑陋的树根》获文艺报征文优秀作品奖，另有作品获市级文学创作奖。现为天水市作协理事；刘淑静供职于天水市中医院，是90年代天水文坛活跃的女诗人，本章第三节将评述她的作品；李蕴珠，供职于天水卫生局，号猗竹阁主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甘肃省诗词学会副秘书长，天水诗词

学会理事,《渭滨吟草》副主编,自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在各类报刊与选集发表诗词作品百余首,词作《貂裘换酒》获甘肃省庆回归诗词大赛一等奖。诗词清新婉约,意蕴深厚;李桥,号雪香村客,供职于天水市党史研究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百余篇(首),现为甘肃省作协会员,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天水市诗词学会会员,《渭滨吟草》编辑。她的诗词豪爽奔放,饱含深情;杨玲玲,号蔚兰馆主,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天水市诗词学会会员,《渭滨吟草》编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在各类报刊与选集发表诗词作品数十首。她的诗词朴实无华,蕴含真意;张向红(笔名紫桐),号沁菊轩主,供职于天水市水泥厂综合经营部,中华诗词学会、甘肃诗词学会、江南诗词学会、天水诗词学会会员,《麦积诗苑》编辑。自1985年以来,先后在各类报刊与选集发表诗词作品200余首,《玉楼春·河畔行》获首届“苏东坡杯”中国诗书画大赛佳作奖,诗词细腻清新;筱风,原名王小风,天水地区的小说作家,本章第二节评述她的作品;兰叶子,本名刘勇勤,网名缥缈孤鸿,天水地区诗人,本章第四节评述她的作品。

第一节 关注女性生活,探求历史真相——庞瑞琳创作论

庞瑞琳,甘肃省天水市人,《花雨》杂志副主编。自幼酷爱文学艺术,从1972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中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70余篇(部),有报告文学集《碰壁的浪花》(与人合作),小说集《庞瑞琳小说选》,长篇纪实文学《幽灵飘荡的洮河》,散记《诗圣行歌》,长篇小说《苦太阳》(与贾凡合著)等,其中短篇小说《清明时节》《秋叶》等获得了多种奖项。

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庞瑞琳是一个辛勤的耕耘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也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其创作既忠实记录了西部农村女性走出



传统,实现自身解放的奋争过程,也客观记录了发生在甘肃的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纵观庞瑞琳的创作历程,大致可以新世纪为界。新世纪之前,庞瑞琳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集中反映农村妇女为争取个人生活和婚姻的自由而进行的挣扎与抗争。新世纪以来,女作家的创作范围开始扩大,本着作家的良心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力求探求历史的真相,体现了女作家的反思与批判意识。

一、关注挣扎在传统中的女性

庞瑞琳曾从事过8年的妇女工作,因此从创作初期开始,就一直关注女性的命运。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与细腻,将笔触伸向妇女,倾心关注妇女的生活、情感与命运,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的妇女形象。富有情趣的描写、清新婉约的艺术风格、精巧的情节构思,使她的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在甘肃文坛引起强烈反响。

西部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承受了太多来自传统和男性的压力。她们为争取自身独立人格、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屈服过,也反抗过,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庞瑞琳的小说对存在于农村的严重的重男轻女、包办婚姻、入赘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紫色的梦》(1986)中秀梅年轻守寡,婆家张罗让其再嫁,前提却是要招女婿上门,要四海改姓田。婆婆为了能留住秀梅,不时给死去的儿子宝生上香,试图给秀梅心灵上一道枷锁。本来两情相悦、皆大欢喜的好事,却掺杂上了庸俗的传统观念。《秋叶》(1986)中换换羡慕那些恩爱和谐的男女,希望自己和丈夫春娃也能如此,但春娃终因换换手术后不能生育而离开。《读不懂的儿歌》(1990)反映的是农村的入赘现象。男子婚后到引男家,却心有不甘,想要回到自己村里去,否则无脸见家人,这使引男面临着在父亲和丈夫之间难以做出选择的困境。想生男孩,给女儿起名“招弟”“引男”。因为没生男孩,父母有沉重的心理负担,连引男自己也成了传宗接代的工具了。《绿村》(1991)写莲莲被禽兽般的公公施暴,不

仅婆婆跪求她忍，娘家也叫她忍。公公砍伤去质问的丈夫而被捕，莲莲反过来还要去请求释放。可以看出，陈旧的传统观念仍然是压在秀梅、换换、引男、莲莲这样的农村妇女头上的枷锁。尤其是莲莲，村里人将所有的过错都压在莲莲身上，认为婆婆的死、公公入狱都是她的错。实际上，这是传统思维对女性的严重偏见。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让女性真正站起来，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偏见，消除那种将女人当做传宗接代工具的思想痼疾。

当然，妇女并未一味地逆来顺受，庞瑞琳的《清明时节》（1982）就描绘了秀秀的故事，她勇敢地走出第一次婚姻的阴影，反抗兄嫂对自己的二次买卖，自己为自己的婚姻做主。《杏子熟了》（1989）中杏子从对学生娃映泉的朦胧情感，到挣脱后爹的束缚，跟收杏子的外地小伙子私奔。这对农村的女孩子来说，是迈出了大胆的一步。杏子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映泉过于珍惜男人的尊严，喜贵又非自己的真爱，那些学生娃考上大学后会像秋菊的未婚夫甩掉秋菊一样甩掉自己。比较而言，《清明时节》中秀秀非常实际，认为男子如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能体贴他人，就可以和他谈婚论嫁。这里，秀秀首先考虑的是生活，而不是心有灵犀、山盟海誓的爱情。

而在《货郎阿婆的罗曼史》（2000）中，小说叙述了货郎阿婆盛春桃一生的情感遭遇。常老师唤醒了盛春桃内心对真正爱情的渴望，最终也解救出了盛春桃，但两人不能长相厮守，无法结合，反倒使盛春桃被骗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万祥。在此，常老师试图去扮演一个救星形象，实际却使盛春桃陷入了更大的情感漩涡之中，他使盛春桃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去寻找被唤醒的那份情。我们不能苛责常老师，是那个时代使他们注定成了一对有缘无分的悲情男女。当然，女作者也理想化了常老师和盛春桃之间的感情，现实或许远比小说要残酷。

庞瑞琳写女性命运的小说显示了比较复杂的内容，有些作品写出了女性在爱情婚姻遭遇挫折或失败后，情感无处寄托，内心苦闷彷徨，无所适



从的状态。《快乐的女光棍》(1994)刻画了三个女性:医院大夫梁彬,病人肖燕和周翔。梁彬因丈夫有外遇,与其离婚;肖燕因患心脏病与青梅竹马的男友勇勇在爱与不爱中徘徊;周翔因患过敏性紫癜可能丧失生育能力而与所长儿子冷静分手。这三个女性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但在情感方面却有着相近的处境。虽然她们都希望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渴望被人爱,受人呵护,但人生的不幸——婚姻的失败、病痛折磨——使她们无法如正常女性那样去爱去恨,她们只是将个人的情感郁结于心。“快乐的女光棍”其实并不快乐。“她们这三个人都竭尽全力想帮助对方有个爱的归宿,可又怕其中任何一人一旦有了归宿,就会离开这个整体。”三人的关系已非普通关系可以界定的了,有了同性恋的倾向。当然她们内心也不乏对异性的冲动,对艳遇的羡慕渴求,这些也说明她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者。她们更多的是无法从异性那里找到情感上的归宿,无法得到心灵上的慰藉,只能回诉于同性,以暂求内心的平静。小说结尾写道,周翔与畜皮的对象吹了以后,“三个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笑得心里空落落的,有种饥荒感”。的确,缺失了男人的世界里,女人的情感将处在一种空虚悬置的状态之中。

在这些小说中,男性思想中大多充斥着传统观念的遗风余韵,如《秋叶》中换换丈夫春娃等;或者软弱卑怯,无法抗拒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如莲莲丈夫等;即使如常老师这样的男性,也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相比之下,女性在生活和压力面前,显得更加勇敢和大胆。她们敢爱敢恨,为了自身的幸福敢于同家庭决裂。在对待男性和女性时,女作家之所以如此态度鲜明,一方面是对传统观念中男权意识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自我觉醒的礼赞。

庞瑞琳对女性的刻画并未简单地停留在同情女性,揭露传统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上,而是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她们在面对传统和男性时,在寻找自我、追求新的生活时既有坚定决绝的一面,也有安于现状不再抗争的一面。她们勇于走出丈夫的呵护,敢于追求自己的所爱之人,

显示出行为的大胆、思想的解放。同时，女性也有自身的弱点，她们心目中理想的爱情婚姻比较模糊，在情感的漩涡中她们苦苦挣扎，处于犹豫彷徨、苦闷无助的状态。这是对西部女性的真实写照。文明就是在这样反复中曲折前进，而女性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过程也是在自身觉醒的基础上，在与外界的抗拒中找到合适的角色位置的过程。这表明女作家对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女性问题的理性思考。

二、对历史的回顾

庞瑞琳不仅仅关注女性的生存与命运，也在不断地关注着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的底层民众，忠实地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变迁。《心愿》（1980）中王永乐对毛主席像视若神明的举动，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农村，领袖神圣化的思想痕迹还存在，但也透露出新信息：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开始关心下层工人的生活。小说写到局长拿国家财产换住新房，而劳动模范一家两平方米的床睡大人孩子五个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民差距和官员的腐败。《约法三章》（1980）反映了农村实行新政策后农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乐二叔重操旧业，违背与老伴的“约法三章”去唱戏。农民对“四人帮”的谴责，乐二叔的“华主席领咱除四害”的唱词等，使得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而对于已经尘封多年的和一些敏感的历史事件，她用自己的写作加以评说，这本身对女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它挑战作家的洞察力，挑战作家面对历史的勇气，也挑战其坚持下去的耐心，庞瑞琳做到了。1997年，她与贾凡自费到偏远荒凉的河西走廊深入实地调查访问，顶风冒雪，不辞辛劳，用两年时间合作完成了54万字的长篇巨著《苦太阳》。2003年和2004年，她又赴定西、兰州、临洮、岷县及会川、九旬峡、古城等地考察采访，于2006年完成长篇纪实文学《幽灵飘荡的洮河》。这本书也是庞瑞琳创作中耗时最长、出版最费周折的一本书，凝结了她多年的心血。2006年10月中旬开始，庞瑞琳与他人沿诗圣杜甫当年游历陇右的行踪，进行实



地考察，以文学的笔触，于2007年完成《诗圣行歌——杜甫陇右踪迹探寻散记》，收录了23篇旅途散记，忠实地记录了沿途的山川风貌、人文风情以及遗迹景观。查漏补缺，详细订正，理清了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一些失误。

《苦太阳》写的是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活，这里曾是没有高墙的人间地狱，在这片旷野荒漠深处，从1958年5月至10月，前后押送近3000名劳教分子，其中主要是“右派”分子。有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共产党员，有机关干部，有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劳教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2000多人尸横戈壁荒滩，有幸活命的是极少数，至今活在人世的已寥寥无几。对于这段惨痛的历史，很长时间以来无人能鼓起勇气面对。直到新世纪，才先后有人揭开层层历史的面纱。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赵旭的《风雪夹边沟》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等作品，多以纪实的手法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等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血淋淋的事实。而庞瑞琳的《苦太阳》则是以小说家的笔触，通过艺术的想象和虚构来曲折地反映夹边沟劳教农场这座人间地狱，折射出当时中国的历史现状。霍松林先生看完小说后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苦太阳》告诫人们不忘过去，不忘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①

小说以舟城的流放群落为主线，塑造了秦岳、郑直、安宁、柯楠、梁世杰等一大批被历史无情捉弄的知识分子，讲述了他们在夹边沟所遭遇的非人待遇，让人们审判人性的恶，进而重新审视历史。

小说深刻揭露了在苦难面前，人性的恶和自私的一面会暴露无遗。夹边沟成了丑恶人性展示舞台。有些人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不择手段，偷吃抢喝，以牺牲他人来延续自己生命。人的尊严、人格全然没了伸张的余地，有的只是挣扎在维系生命的状态。有些人揭发批斗甚至出卖同在苦难中的

^① 吴凯飞《用主血谱写生命之歌——访我市著名女作家庞瑞琳》，《天水日报》2006-9-28。

朋友，以赢得管教的信任，求取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如同金泉、齐大个等。但这只是个人的一相情愿而已，结果往往是害人害己，甚至丢掉性命。人们相互之间猜忌批斗，犹如上演一出荒唐剧，既让人毛骨悚然，又显得滑稽可笑。如对洋博士陈时伟的批斗场面，青年学生、白帆、闫金泉轮番登台发表演说，进行由里到外的灵魂洗礼。而白帆在演说中居然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比作阎王，极具讽刺意味。更为触目惊心的是，由于人性恶的肆意蔓延，致使一个个鲜活生命如草芥蝼蚁般的消失，如掉进沸水锅里，农场领导拒绝送往大医院，而未能得到救治而惨死的王建平；因火焰山塌方致死的白帆；拼命干活以试图摘帽而活活累死的闫金泉；被沙尘暴活埋的韩雨亭；被扣饭而跳井的向文林，等等。在此，小说在展露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同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那些历史事件的主体——人。

小说穿插了秦岳与姜曼的爱情悲剧，显示出在亲情反目、夫妻为敌的时代，还存有一份可贵的感情，它如荒漠中的甘泉，让人感到这个世界还有一丝的温情。但这却正好与那非常时代、非常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样的爱情注定是悲剧的结局，它太弱小了，无法抵抗当时强大的时代洪流的冲击。

大跃进期间，甘肃于1958年6月至1961年6月间，动用16万民工，耗资1.5亿元，上马“引洮”工程，计划从甘肃省岷县古城村引洮河水至陇东庆阳地区的董志塬。当时未经认真勘测，仓促上马施工，虽然轰动全国，最终因工程量巨大，引水距离长，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中途夭折，于1962年4月正式下马，使“引洮上山，幸福万年”的“共产主义工程”化为泡影。《幽灵飘荡的洮河》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书中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图片，并采访了亲身经历过“引洮工程”的人，折射出在大跃进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不尊重自然规律，盲目冒进的风气，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深重的灾难。让人深思的是，对这段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其中许多人持否定和谴责态度，但有些人却认

为并不是坏事。如通渭工区党委秘书周建国说：“引洮工程好呀，救活了我们通渭县的五六千人。”天水工区被服厂工人田桃英认为自己上引洮工程是逃脱了婆婆的虐待。历史极具反讽意味，本来是劫难，却在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对历史的解读都相同，但至少说明，历史事件具体到个人的时候，会存在差异性。

庞瑞琳说，岁月的流沙也许会一点点掩埋人们许多以往的记忆，但总会有许多东西浮在这流沙的上面，让你无法忘却。所以她的笔触就是要在这一领域里拓宽、拓深，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忘记过去。今天，我们在谴责历史时代的同时，也该反思人类自身。当同样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该怎样面对和处理，我们会像历史中的那些人一样吗？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但历史可供借鉴，这或许是《苦太阳》和《幽灵飘荡的洮河》给世人的深刻启示。

庞瑞琳的作品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地域风情。《苦太阳》和《快乐的女光棍》等小说中向人们展现了原汁原味的西北民歌。《饥谨大学生》中对西北的饮食如数家珍，如打卤面、搓鱼儿、瓜瓜、浆水苞谷面疙瘩等。有些作品对西北的婚姻嫁娶风俗也有所描绘。在刻画农村的人物时，语言运用符合其身份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方言，极富乡土气息。而麦积山、祁连山、沙漠、戈壁等自然景观，沙尘暴等天气状况等在小说中时有闪现。这些都说明了庞瑞琳创作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很好地吸收和融化，也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第二节 女性世界与梦魇色彩——论筱风小说

筱风，原名王小风，甘肃甘谷人。1995年开始写作，先后在《飞天》《朔方》《短篇小说》《佛山文艺》等刊发表小说2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蜗牛壳里的爱情》，系甘肃作家协会会员。她以朴实温和的笔调剖析了一个个具有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剖析了当代女性在特定的时代中所持有的精

神状态；同时，她继承了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传统，使得她的小说又具有神秘的梦魇色彩，使读者在似真似幻的意境中思考人性，审视自身。

一、悲戚的女性命运

在筱风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不管身份如何，最终都逃不掉悲剧的命运，作者通过对不同悲剧形象的塑造向读者揭示悲剧背后的真相，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1. 强烈的占有欲

人们总说男女间的爱是专一而又自私的，然而这种专一和自私的前提应是在彼此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之内。一旦专一和自私的情感要求超出了对方能够承受的程度，那这种情感的合理性也就成了问题。筱风通过对这类女性形象的描绘，揭示和挖掘了这种人性的缺陷。

《无处可逃》中的红果，从镇中学调到县一中后，自己的学识、相貌打了折扣，而丈夫赵平却处处受人恭维，这使她心理变得扭曲。丈夫欣赏他的得意门生陈丽在她看来是“花心老牛想吃嫩草”。当她冲进教室抽了陈丽的耳光，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又被“那个男人是你的”的意识所深深支配。红果对丈夫深切而又近乎癫狂状态的爱没有挽留住最终堕落为赌、色俱全的赵平，在离婚的要求面前，红果认为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已为赵平所拥有，她选择为自己的自尊心复仇而拒绝离婚。小说中的红果，就其悲剧性的结局，让人同情，但她所表现出的人格特质是有缺陷的，甚至近于变态。

如果说红果心理的扭曲是因为她自己心理的失衡，那么《乍暖还寒时候》中季红的爱情悲剧就是因为她的专横。由于罗大勇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能常陪妻子，季红便使尽各种手段去消除她可能有的怀疑。最终她跑到丈夫的领导面前声泪俱下，在自己虚构的婚外恋故事里给罗大勇的品德下了断然的定语。终于，季红的目的达到了，罗大勇如所愿按时上下班，按时回家吃饭，甚至也不接外人打来的电话。季红认为她对丈夫具有绝对



的控制权，她爱丈夫没有错，但她爱得是那么的专制，那么的强悍，虽然丈夫最终如愿回到她的怀抱，但这种爱是牵强的。季红身上表现出的是女性性格缺陷的又一形态。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心理变态、扭曲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进程，对爱情的深蕴在人性层面上进行解剖，从而使得筱风的此类作品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人性探索。

2. 极端的反抗

在经典爱情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有句经典台词：“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被人爱。”女人一旦失去了最美好的爱情，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婚外恋”“自杀”等行为便常常成为女人最直接、最有力的反抗形式。

《羊大为美》中的凌子因为一时失身而得不到爱人的理解，便自甘堕落当起了小姐，她程序化地和别的男人调情，故意跟男人要钱，还装腔作势做出俗不可耐的样子。终于在10年后的一个傍晚，因一男人咬掉她的乳头而杀了他，至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载我飞翔》中杜鹃仅因受不了家里的困顿和初恋男友的抛弃而卧轨自杀。所有这些悲剧的发生都源于她们对爱情的失望与无奈，也是她们对不满生活的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终究是无力的，她们为生活所累，也挣扎过，为自己的幸福试图努力过，但是她们最终失败了。她们反抗这个社会的方式太过于极端，所有的努力只能带给她们无尽的悲苦。

3. 世俗化的爱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和都市化的急剧发展导致了整个社会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的改变，金钱和物质逐渐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中占据首要地位，“世俗女性”应运而生，“热爱都市生活，追逐世俗欲望”^①是

^① 乔以纲《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世俗女性”最为突出的特征，她们在金钱和物质欲望的驱使下，歪曲地体现着自己的生存价值。

作为女人，追求幸福、享受生活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这种追求要看运用何种方式，一旦与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往往会适得其反。筱风对此类女性的性格行为是怀着悲悯的心情来进行否定的。如《正在飞过的鸟》中的易茗茗，高中毕业就嫁给了一个身形瘦小、面容黝黑、头发都要绝顶的男人，在追逐名誉和利益的游戏里只收获到虚无和苦痛。抛开丈夫她什么也不是，她注定要在这种困境中生活一生。

筱风对一系列女性命运的关注，体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出现这样一批女性是情理之中的，她们为自己的幸福付出着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使女性生存价值的命题突显出来。

二、独特的表现形式——“梦魇”色彩

作为当代女性作家，筱风不仅关注女性自身命运，同时还对人性道德观念进行深刻剖析，表现了女作家普遍的人文关怀。作者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中传统志怪小说的艺术手法，用非现实世界揭示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性缺陷，从而产生教化于人的作用。

“传奇”“志怪”本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在很多志怪小说中，神秘意象成为全篇或明或暗的线索。筱风善于创造非现实世界，她许多作品都表现出荒诞性的特点，极具神秘色彩。她以女性特有的柔情款款讲述着一个个亦真亦幻的故事，有时甚至直接引用《聊斋志异》里的话语作为文章的题目。

如《目灼灼贼腔未改》就是出自《聊斋志异·婴宁》：“婢向女小语云曰：‘目灼灼贼腔未改’^①！”中的一句话。此话本是用来表现王子服对婴宁的痴迷和专注，蒲松龄志描绘了自己幻想中的一个美好的女子——婴

① 蒲松龄《聊斋志异》昆仑出版社版2001年第54页。



宁。然而，筱风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即因果报应。戚叔因为财迷心窍，杀了渡客抢了“袁大头”（银圆），随后“隐居”起来。在妻子生下儿子太平后，妻子死了。儿子的那双眼睛让戚叔像见了鬼一般倒退，儿子七岁的时候操刀杀猪竟一镢头砸死了戚叔，戚叔临死时说：“太平那兔崽子一睁眼我就觉得不对，这孩子的眼神太像那个渡客了，贼亮贼亮……我知道他是报仇来了。”另外，《魔》里描写的男巫以及阴森的村子也让人匪夷所思，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个村子如此阴森？美女蛇的出现让读者恍然大悟，因为人的贪欲导致动物无立足之地，村子里所有人的死最终证明了动物的报复。

作者对神秘故事的构思，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感，这种神秘的意境是一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再现。小说的可读性在现实而又神秘的美感中得到强化，为读者认同作者预设作品中的理念打下了基础。从这一立场讲，志怪不过是一种手段。结果可能正是如此：当读完小说，读者已沉浸在人的良知和生态平衡理念的思考中，而贼亮的眼神和美女蛇这种神秘事物的存在终于成为次要。

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筱风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具有生活实感的女性形象，写出了女性命运的形态和生命的流程。她们一个个如菡萏临水，妩媚动人，周身都摇曳着艺术的光辉，她们的命运似一曲曲哀婉凄切的咏叹调，让读者在唏嘘、哀叹的同时，心中充满悲悯和苍凉。筱风继承传统志怪小说的写作手法，在似真似幻的意境中传达着深邃的道理，引发出对女性和女性问题的诸多思考，体现出筱风创作的独特风格。

第三节 以手抚心 只因有爱——淑曼诗文探析

“不想把一切都表明/也不想告诉你/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果能/只要一星温暖的目光/我将以手抚心/沿着终期为现实的/梦境之路/走



去。”这就是淑曼，带着人只要有一丁点儿梦就都不能轻言放弃自己的执著，带着心淡如水、心香如菊的做文追求走进我们的视野。淑曼，原名刘淑静，女，甘肃兰州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淑曼爱情诗文选》《此情依依——淑曼诗文小说选》《絮语微言——淑曼诗文小说选》等，现在天水市中医院工作。她曾经说，“假若你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女人，那么你不妨去写诗”，就是这样，她在诗中阐释着爱的信念，将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摒弃自我、突破自我，生命赐予我们每个人近乎均等的机遇，她是一个永远的追求者，一如天地间呼啸向前的骏马，因为执著而美丽。

在淑曼的诗中，描写最多的当推爱情。对于爱情的理解，她“相信自己编写的童话/于是我变成童话篮里滴着露水的花朵/羞涩的祈愿被你的手指轻抚……让我的渴念/仿佛靠着你的背景/让我的心情/并不刻意的亮如一缕阳光/最终你温情脉脉/每一个姿势都是爱恋”（《爱恋》），诗人用女人特有的细腻感受爱情，让儿女情长如清泉推涌着激情的升腾。恋人间应该是“你来了/还没开口，我已猜到/其实我宁愿清醒时/忍痛地放弃你/也不愿意听你谎说什么地老天荒/有些事/总要过去/只是需要慢慢想想/你面前仍然有诱人的花香/而我只是需要/一个手拉手就不会跌倒/一个心贴心就不会动摇的人”（《人生一段小插曲》），恋人间的心照不宣、心有灵犀在诗人智慧的笔下妙然生花。

淑曼的爱情诗是多姿多彩的，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诠释她诗歌的灵魂：红色象征热情奔放，淑曼把最美好的爱情写成火焰，使读者在字里行间品读到的热情，要爱就要爱得彻底，“我无意眩晕/却已幸福得双眉闭拢/正如粘在蛛网上的一只昆虫/愈是挣扎就愈是被缠缚得紧紧”（《爱到极致》）。为了爱情，诗人愿意一直跟随爱人，伴至终老，“如果你是轻风爱人/我就是紧跟着轻风的后面/一场含情的薄雨/你睁大眼睛/雨会突然降临/那是我心和着你心的节奏/而悸动的声音”（《如果》）。应该说爱情是她一生最重要的收获，也给她的诗歌带来了灵感和不可或缺